

藏语文是语言文字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访我国著名藏语专家胡坦先生

林秀艳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我国著名藏语专家胡坦先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从事藏语研究。作者围绕“藏族语言文字”这一主题,就藏语方言、书面语、声调及其使用状况对胡坦先生进行了采访。

关键词 藏语文;方言;书面语;声调

中图分类号 H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9)04-001-05

林秀艳 胡坦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主修藏语,逐渐走进藏语研究的领域。六十年来,您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之托,围绕“藏族语言文字”这一主题,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民族之一,其创制和使用的藏语文是语言文字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藏语和汉语以“藏”西“汉”东,涵括其它同源亲属语言,成为汉藏语系的核心。那么首先请胡老师谈谈藏语为何能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胡坦教授:首先,它有较早的文字记录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藏文大约创始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一千多年来,藏族运用这套文字大量从事翻译和著述,积累了浩瀚的文献典籍,为今日研究古

代藏族语言和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第二,藏文是一种较好的拼音文字,它大体上反映出创造文字时代的藏语语音面貌。以此为出发点,无论是上推古音,还是下及今音或者横向比较,都比非拼音文字(如汉字之于汉语)方便可靠。第三,藏语有丰富的方言材料。藏族分布辽阔,长期以来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方言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料,深入挖掘活的方言有助于探求语言发展的历史。总之,从事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藏语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之一。

林秀艳:您刚才提到了藏语有丰富的方言材料,我也听说过藏族谚语“一个喇嘛一套经,一个地方一种话”,也就是说藏语方言众多,口语因地制宜。那么,请您简单给我们讲讲藏族方言的产生、划分以及方言间的主要分歧所在。

胡坦教授:方言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从早期藏文文献看,古代藏语已有方言分歧的迹象。公元7—

9世纪,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以及拼音文字的创制促进了方言的接近和语言的统一。但是,随着强大起来的吐蕃王朝不断扩展领土,藏族人民的足迹遍布广阔的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这块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由于地广人稀、山川险阻、交通不便,是极易滋生方言的。加之9世纪中叶以后,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长期处于割据状态,更助长了方言的分化。十二三世纪著名的藏族政治家和学者萨迦·贡噶坚赞在《乐论》中曾对各地藏人的发音特征作了一番生动的描写,比如,他曾这样写道:“前藏人声音洪亮而婉转,后藏人如马嘶鸣而豁亮,阿里人声音尖锐而短促,康巴人声音威武而粗犷”,足见当时的方言差异已经非常引人注目。到了近代,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交通的改善,各地交往逐渐增多,人们惊讶地发现有些地方话之间的差别已经到了难以交流的地步。

现代藏语有多少种方言,各家说法不尽一致。50年代经过我国学者调查,将国内藏语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和云南藏族聚居区,西藏的昌都专区和那曲专区的藏话也属康方言。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两省的藏族聚居区。此外,四川的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也属于安多方言区,三大方言中,卫藏和安多两大方言内部比较一致,康方言内部分歧较大,需细分小方言和次方言。

方言的划分还要考虑到国外藏语的情况。罗里希和西田龙雄提出了五分法。他们以西藏为中心,把整个藏语分为五个方言群:1、中部方言:相当于“卫藏方言”;2、东南部方言:相当于“康方言”;3、东北部方言:相当于“安多”方言;4、西部方言:包括拉达克(la dags)话、巴尔提话、斯普里格话、拉呼儿话等;5、南部方言:包括斯皮提话、卡噶特话、夏尔巴话、亚东话等。

根据现有材料,考虑到国内外藏语的整体分布和结构异同,我们对现代藏语的方言划分提出过如下设想:先以声调作标准,把藏语分为两大方言——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有声调方言包括卫藏、康和南部诸方言,无声调方言包括安多方言和西部方言。然后再根据关系远近,细分若干次方

言和小方言。比如卫藏方言又分为前藏话和后藏话,康方言又分为南路话、北路话、牧区话,南部方言又划分为卡噶特话、夏尔巴话,安多方言又分为农区话和牧区话,西部方言又分为拉达克话、巴尔提话、斯普里格话。当然,确切地划分方言还有待于更深入地调查研究。

再说说藏族方言的分歧。藏族方言的分歧主要在语音,语音上的差异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三项特征: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声母的对立、辅音韵尾的多寡。拿这三项特征作标准来看三大方言的差异:卫藏方言和康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无声调,清浊对立是安多和康方言共有的特征,卫藏方言全浊声母都已清化,代之以送气和不送气或声调高低的区别;从辅音韵尾来看,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接近,韵尾较多,而康方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除了喉塞音韵尾外,再无其他韵尾,非常接近毗邻的彝语支语言。如果从“能懂度”考察,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处于两端,差别之大几乎到了难以通话的程度,康方言介乎两者之间。

林秀艳:在藏语三大方言的分歧上看,有无声调还是最引人注目的。在一个语言内部,一部分方言有声调,另一部分方言没有声调,这种情形,在整个汉藏语系里,虽非绝无仅有,至少也是罕见的。所以请胡老师讲讲藏语声调是如何产生的?

胡坦教授:声调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汉藏语系语言,不可不考察其声调之现状和历史。藏语的声调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不仅对藏语语音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从历史上看,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现象,产生较晚。一般认为,公元七世纪前后,即藏文创始时期,藏语还是一个没有声调(对立)的语言。那时前缀音和辅音韵尾等比较发达,字音高低的变化,只是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此后一千多年来,藏语的发展,因地而异。有些方言,在语音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声调系统;有些方言,则保存前缀音和辅音韵尾较多,至今依旧没有声调。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的共同点是保留古音韵特征较多,如清浊声母对立、较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音节也有习惯调,但并未用来区别语词。而从历史文

献和现代方音的比较来看,“康藏”方言声调的产生,主要是自身声韵母和韵尾大量简化的结果。所以说“藏语声调的产生不是来自外部影响,而是内部结构调整的结果。”

就拉萨话而言,影响声调产生和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三项:1、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前缀音的脱落;3、辅音韵尾的简化。拉萨话最早分出高低两类调,跟前两项演变有关。高低调再分化,跟第三项演变,即韵尾的影响有关。我们可以说,现代拉萨藏语声调的来历,大都可以从古藏语音节解结构的一“头”一“尾”中找到渊源关系。

拉萨话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前缀音的脱落和辅音韵尾的简化,使得语音系统中区别手段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无适当的补偿办法,同音词会骤然增多,不利于交际和交流思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拉萨话除大量发展双音词外,在语音上的补偿手段,就是增加元音和利用声调。声调随着某些音素的消失,有伴随特征或者说由“羡余特征”(redundant feature)变为“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跟辅音元音音位鼎足而三。这种语音区别特征的转换需要一定条件和时间。交替过程常有两种特征“共生并存”“此消彼长”的过渡阶段。就拉萨藏话来说,声母清浊对立转换为高低调的对立已经完成,而由辅音韵尾所引起的声调再分化仍处于过渡阶段。有些韵尾弱化而未完全脱落(*-s*-d*->-?),有些韵尾“销声”而未“匿迹”(如在元音上留下痕迹)因而出现许多“共生现象”(如降调常跟喉塞韵尾共生),使得语言学家在区别主次决定取舍上颇伤脑筋。拉萨话声调分类问题上所以众说纷纭,除个别属于审音谬误外,大都与此有关。但不管怎么说,声调已经成为拉萨话语音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声调的产生是藏语(康藏方言)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林秀艳:胡老师,藏语方言众多,分歧较大,但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有没有共同性,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

胡坦教授:藏语演变的普遍趋势是声母系统和辅音韵尾的简化。尽管简化程度不同,但就我们所知,现代藏语中没有哪一个方言的声母和韵尾系统比古藏语言复杂。简化较多的方言导致声调的产生,

简化较少的方言没有产生声调。这是藏语非常引人注意的特征。

藏语是一个词汇丰富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里,藏族创造了大批的语词,也吸收了一定量的外来词。从词汇发展史上看,藏语(特别是书面语)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语素创造新词。无论是古代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尽管带来不少的外来词语,但自己制造的语词仍占绝对优势。有些借词后来被译词所代替的例子也不少。不过,民间交往、口头交流,禁忌不多,什么方便使用什么,在借词中以汉语借词最多。

语法上,形态变化虽然比汉语发达,但从古到今也有不同程度的简化。助词的作用在增加,分析手段逐渐取代综合手段。名词后的格助词,动词后的辅助词是释读藏语句义的关键。若依重要性而言,三种常用的语法句式,第一是助词,第二是形态,第三是语序。各种句式动词句最多,影响力最强。历史上的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都逐渐在句尾加上了判断词“是”或存在动词“有”使藏语成为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

林秀艳:正如您所言,藏语口语分歧如此之大,有些方言之间的差别已经达到难以通话的地步,但是书面语却相当统一,是全民语言统一的象征。这种现象的产生一定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吗?

胡坦教授:藏族文字产生较早,据藏文史书记载,松赞干布(?—650)即位前,吐蕃尚无文字。松赞干布当政后,先后降服了工堡、娘堡、达堡、苏毗和羊同诸部,建立起西藏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以及长期征战中,松赞干布深感无文字之苦,就决定派大臣土弥桑布札等人,携带重金,前往天竺和西域诸国,修习佛法和声明之学。土弥桑布札学成返藏,依据梵文的一些字母体系,结合藏语实际,创制了藏文,并用它写下了八部字书和声律,翻译出几部佛教经典,后世誉为“字圣”。此类记载有点传奇色彩,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即藏文的产生跟古代藏族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强大推动了文字的创制,文字的创制又促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现存最早的藏文文献多属八九世纪的遗物,通称“吐蕃文献”,包括木简木牍、纸卷皮卷、金铭石刻等,内容以会盟祭祀、记述功德、历史文书和佛教经典居多。例如拉

萨布达拉山前的“外碑”(763年)和大昭寺门前的长庆会盟碑以及敦煌石室发现的大批藏文手卷和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等等。这一时期的藏文有许多特点不同于现代藏文,比如正字法尚未定型,异体字比较多,还有一些现行藏文已经不通用的特殊符号和拼写方式。总之,7—9世纪的吐蕃文献是藏语书面语的初创和奠基阶段,对于研究古代藏语具有极高的价值。

藏文在早期的一项重要用途是译经。吐蕃王室崇奉佛教,为此专设译场,延聘译师,将大批佛教经典译成藏文。成书于824年的《丹噶目录》,收入译经六七百种,其中仅从汉文译为藏文之佛教经书就有31种之多。十四世纪编成的藏文大藏经收书4500余种,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这项持续数百年的有组织的规模宏大的翻译事业,对于藏语书面语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

另外,藏语史上几次有名的“文字改革”、“词语厘定”、“正词法规范”等也都出于译师之手。其中影响最大并奠定了现行藏文基础的一次改革发生在九世纪初,以噶瓦·白泽、觉若·鲁伊坚参和相·益喜德为首的一批译师,鉴于当时出现的拼写混乱、译语分歧和古今差异等问题,提出书写要规范、译语要统一,“废除难懂难读之古词,代之以易读易懂之词,以适应地区和时代之需要”。这一主张得到吐蕃当政者的支持,赞普以法令形式推行改革。如明文规定“各译场不得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方言习惯译制新词术语。确需创制者,应说明语出何典、创新缘由以及原文出自何种语言,并需报请译经大堪布和大译师核准,待钦定后方可正式列入词条目录后面……”为了统一译名,后来还编辑了藏梵对照的《翻译名义大集》,所收术语近万条。为了简化正字法和消除异体字,这次改革取消了一些由于语言演变已不读音的字母和可有可无的成分。在藏文史上,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成功的文字规范化运动。经过这次规范,藏文正词法基本定型,异体词大部分消除,佛经译语趋于统一,书面语更加成熟。

自从有了文字,藏族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作品大量问世,在天文、医药、历算、文法等方面也有不少名著问世,这对推广普及藏文,丰富发展藏族书面语起了重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藏文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在宗教文化和文学历史上,逐

渐进入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藏语书面语向着更趋成熟、功能更趋全面的方向发展,以其超方言、规范化和更多的继承性等特点为社会所接受,成为全民语言统一的象征。

林秀艳: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由闭塞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与此同时,藏族的语言文字本身及其使用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后,请您谈谈藏语文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以及藏语文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面临着哪些问题?

胡坦教授:近六十年来,藏语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藏语本体的变化或称结构上的改进,例如新词术语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语法格式日趋精密与多样化等等;二是语言功能的变化,例如藏语使用人口的增加,使用领域的扩展,识字人口比例的增长,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广播、电视、电影等现代媒体中广泛使用藏语文,藏文信息处理系统和精密照排的开发等等。它使得藏语文使用范围空前广大,使用量倍增,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藏语文的实际效用大增。与此同时,随着藏语文教学的加强和藏语文研究的进展,藏语教科书、工具书、参考书、文艺著作与通俗读本,及至科技书刊、研究专著等形式多种多样,数量与日剧增。国内一些民族院校还专门开设了藏语专业,培养藏语文教学、科研和翻译人才。这些都对藏语文的广泛使用和良好的发展势头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藏语文没有走向没落和消亡,相反,其语汇不断扩充,功能不断增强,仍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当前,西藏社会现代化的步伐日益加快,信息传输、思想交流从形式到内容日益频繁和多样化。这就要求藏语文进一步适应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迎接新时代的挑战。目前,藏语文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藏语的方言与共同语问题,言文如何接近的问题,文字进一步规范的问题,新词术语的创制问题,特别是随着“科教兴藏”政策的实施,如何利用藏语文普及现代科技问题以及电子时代里藏语文的信息传输问题。另外,随着不同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如何更好的开展双语甚至多语教学问题等等都提上了日程。

总之,历史悠久的藏族语文,承载着藏族上千

年的文明史 ,对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宝库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的贡献。今后藏语文也必将能迎接时代的挑战 ,抓住发展的良好机遇 ,随着藏民族共存共荣 ,做出更大的贡献!
林秀艳 :好的 ,再次感谢您精彩的讲授!祝您和家人幸福安康 ,扎西德勒!

On the Importance of Tibet Language

——An Interview of the famous Tibetan Language Expert Hu Tan

Lin Xiuyan

(Research Center of tibet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well-known Tibetan language study expert, Mr. Hu Tan, is a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ho started his study on Tibetan languag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paper is the record of the writer's interview of him on the respects of Tibetan dialects, written language, inton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Keywords: Tibetan; dialects; written language; intonation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

启 事

- 1、凡投本刊的稿件 ,作者未作特殊声明的 ,刊用后 本刊同时获得图书、电子版本和信息网络的使用权。
- 2、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书生数字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等。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 ,请在来稿时声明 ,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 3、来稿作者文责自负 ,如发现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 ,本刊三年内不再刊用该作者来稿 ,并将协助被侵权人追究侵权责任并保留追究侵权行为给本刊造成的损失责任。
- 4、文后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 ,其他格式请参照《学报》已刊发文稿。凡需订阅本刊的读者可通过邮局汇款 ,无需索取订单。

《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